

他們
Them

现代文人的隐与痛

孙玉祥 著

他
們

孙玉祥 著

现代文人的隐与痛

隱与痛

◎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文人的隐与痛/孙玉祥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10. 4

ISBN 978-7-5057-2708-3

I. ①现… II. ①孙… III. ①文化—名人—研究—中国—20世纪 IV. ①K825. 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1198号

书名 现代文人的隐与痛

作者 孙玉祥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规格 710×1000毫米 16开

15.5 印张 170千字

版次 2010年4月第1版

印次 2010年4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2708-3

定价 28.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自序：镜子中的那些隐痛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云“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我理解“一切历史”之所以成为“当代史”乃是因为作为已经发生了的历史事件，只有在后人的分析解读阐释乃至感动忧伤中，才能复活——否则，它只是一堆没有生命的材料文献。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我认同英国历史学家柯林武德“历史就是活着的心灵的自我认识”的说法。

当然，我们也可以做这样的比喻：如果说，已经发生的事件是客观物件的话，那么，历史就是这些客观事件在人类心灵这个“镜子”里的反映。于是，一方面，“镜子”里的影像是过去事件的反映，我们可以通过这些影像了解历史认识历史；另一方面，“镜子”里的影像又真实地反映了“镜子”自身的性质：它的光洁度、反光度、质地等等。因此，我们看这面镜子里的影像，在认识历史事件的同时，也认识了研究者。历史和现实，主观和客观，就这样在我这面“镜子”中彼此融合相互反映，历史也因此变得色彩缤纷，扣人心弦。所以，真正的历史研究是：他们中，有我们的影子；我们中，有他们的基因。像忧亦忧，像喜亦喜。

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观下，我开始了自己对“中国现代文人的隐与痛”的研究和表达。

先需对“现代”进行界定，所谓“现代”，大致从上世纪初到上世纪末的这一百年，这一百年，是所谓“大时代”——也就是说：我们在一百年里，走过了其他国家也许要几百年才能走过的道路。具体说来：这一百年，是中国由古代中国向现代中国转变、过渡并最终完成的进程，也是一个中国文化走向并汇入世界文化总体格局的进

程，一个在东西方文化大撞击大交流中形成现代民族意识的进程，一个通过语言艺术来折射并表现古老的民族及其在大时代中新生并崛起的进程。

而在这样一个时代的文人，面临的也是过去文人所不曾经历的巨大社会变迁和心理冲突。所谓“文人”之“文”，不外乎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是他的敏感，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感应的神经”；其次，是他的表达欲望与能力，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攻守的手足”。两方面结合，再加上现代文人又是一群在“千年未遇之大变局”中挤压得遍体鳞伤百感交集的“零余者”，因此，他们的隐与痛特别集中鲜明，耐人寻味。而对他们发隐揭痛，就成为我兴趣所在——因此，在书中，我们力图有个性（“镜子”性质）地展现从世纪初的林纾、梁启超，经由鲁迅、钱锺书，到世纪末的余秋雨、王朔这些大牌文人的光荣与梦想、屈辱与隐痛。

那么，究竟他们什么样的“隐”“痛”我最感兴趣呢？钱锺书《围城》之中有这样一个情节：三闾大学中文系主任汪处厚，发现自己年轻的妻子跟同样年轻的政治系主任赵辛楣在“半透明的夜色里”不清不楚后，大发雷霆，手拍桌子问老婆跟赵有什么关系：“你——你快说！”然后“偷偷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我感兴趣的不是现代文人在桌面上的大拍桌子，意气风发，而恰恰是他们“偷偷把拍痛的手掌擦着大腿”的私下举动。不妨聊举一例：

譬如，就“痛”而言，如果我们研究鲁迅这辈子最恨最痛也骂得最狠的人是哪一个，结论不是章士钊，不是梁实秋，不是胡适，不是林语堂，也不是“四条汉子”加郭沫若，而是顾颉刚！更耐人寻味的是，这种恨与骂并未见诸公开文字，而只是出现在日记和私人通信之中。这是为什么？有什么难言之隐难言之痛？是因为阶级立场、哲学观点、还是经济利益？

我们如果深入探究下去，就会发现鲁迅的这个隐痛跟陈源在报上公开讲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那部分，“整大本的剽窃”的这一所谓“抄袭案”有关。而事实上，传播这一谣言的虽然是台上的陈源，制造者却是背后的顾颉刚！顾颉刚此举，可谓“阴险”之至：不仅是个谣言家，造谣说鲁迅著作抄袭；而且是个阴谋家，自己不说这谣言，却让别人去

说，叫鲁迅无从直接批驳。鲁迅之隐之痛，可想而知（详见《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一文）。

然而，更有意思的是：挨了鲁迅夹头盖脑一通臭骂的陈源，却不敢将这种说法的真正制造者顾颉刚招供出来，以便自己摇身一躲，不再成为鲁迅投枪匕首下的狙击物。这又是为什么？他又有什么难言之隐？隐在何处？要解答这个问题，这又不能不谈到一桩几乎与这“抄袭案”发生在同一时间，涉及陈源、周作人、张凤举的现代文学史上另一桩公案——“叫局案”了（详见《陈源为什么死保顾颉刚》一文）。

是的，在解释这些历史人物的“隐”与“痛”的原因时，我的兴趣不在于一般书上的那些历史背景、经济地位和阶级立场，而在于这些事件背后当事人的特殊境遇、个人心理和偶发事件。

当然，我不敢肯定自己的解读都是正确的——好在圣保罗说过：“镜子里看到的影像是昏暗的”。我可以保证的只是：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个性化的，除了能反映历史事实外，还能反映“镜子”本身的光洁、质地和它的裂纹、暗斑。所以，欢迎您批评我这面“镜子”里的影像，同时，也欢迎您批评这面“镜子”。

2009年6月15日于广州

隐与痛

现代文人的

目录

1	自序：镜子中的那些隐痛
1	林纾的气度
4	林纾、梁实秋及其他
7	晚年梁启超
8	苍蝇的发现
13	鲁迅拒客
15	拒客之后
18	我看鲁迅「骂」人
28	鲁迅拿钱骂人
27	鲁迅为什么刻薄顾颉刚？
34	陈源为什么死保顾颉刚？
40	鲁迅与爱国
42	鲁迅与胡适
45	鲁迅与钱玄同
50	也说梁实秋为什么不告鲁迅
58	宽容乎？
63	矫枉何必过正

目录

现代文人的 隐与痛	121	不假「毫毛之助」 的杨树达	118	文言白话优劣辩	115	也说牛人熊十力	112	钱基博的耿介	110	阉猪与割人	107	奇人黄侃	104	认老师与认学生	99	胡适扯谎了吗？	94	胡适与钱锺书	91	胡适与陈济棠	88	刘文典的爱憎	85	刘文典的自信	81	周建人去商务	79	寿则多辱	77	周作人与道光	74	周作人的冷	68	公道不公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隐与痛

现代文人的

186	180	175	173	169	165	160	157	151	148	144	139	135	132	127	124	顾颉刚献九鼎铭文
文人，还是学者？	两起「美国特务」案	钱锺书「默存」	钱锺书改诗	钱锺书不要秘书及其他	钱锺书与鲁迅	《管锥编》为什么用文言？	便纵有千般风情，更与何人说？	——读《陈寅恪与中国文化》	柳亚子的狂与不狂	可怜之人亦有可恨之处	解诗歧途	梁漱溟的悲剧	玩味金岳霖微言	公布他人信件种种		

目录

现代文人的 隐与痛

目录

288	281	226	228	220	218	215	212	205	201	198	192
余秋雨为什么替刘心武辩护	——兼谈小说中的人物的真假	钱锺书两拒「极峰」	凭什么指责钱锺书								
李敖的另一面	——李敖的悲剧	壮夫不为	夕阳未必好，何况近黄昏								
余秋雨与启功	「人间喜剧」	——李敖的悲剧	——李敖的悲剧								
不通得来头大	李敖的另一面	——李敖的悲剧	——李敖的悲剧								
我看王朔看鲁迅	余秋雨与启功	——李敖的悲剧	——李敖的悲剧								
从刘心武被殴到「潇湘馆」被砸	余秋雨与启功	——李敖的悲剧	——李敖的悲剧								
别教人「忏悔」	余秋雨与启功	——李敖的悲剧	——李敖的悲剧								

林纾的气度

林纾应该是中国文坛上的怪才：虽然对外文一字不识，却居然“译”出了一百八十多种外国小说，不少还一出来就红红火火直闹得洛阳纸贵，在晚清文学史乃至思想史上都起了承先启后继往开来的巨大作用。不少文学青年还就因为他那文笔古朴典雅内容却稀奇现代的译本，而对文学和中国以外的世界发生浓厚的兴趣——钱锺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这么写道：“林纾的翻译所起的‘媒’的作用，已经是文学史上公认的事实。他对若干读者也一定有过歌德所说的‘媒’的影响，引导他们去跟原作发生直接关系。我自己就是读了他的翻译而增加学习外国语文兴趣的。商务印书馆发行的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

照说，接触了这么多外国文学，潜移默化，林纾在待人接物上也该有些现代文明的气度才是——没吃过猪肉，还没看过猪跑？然而，在事实上，译了那么多外国文学的他，却好像一点也没有受到他制造的那些“欧风美雨”的侵蚀，做起事来，一样的胡搅蛮缠，“传统”得很。我们不妨来看两个例子。

先看大的潮流方面。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白话文也一举取代文言文成为正统。作为对世界文坛有所了解的林纾，却居然对这“言文合一”的世界潮流一

无所知，对白话文更是恨之人骨：先是写文章给包容白话文人才的北大校长蔡元培，教训他不要藏垢纳污。见没有效果，居然异想天开，希望通过文字以外的力量来消除异己，还自己擅长的文言文一统天下的地位。于是便抽笔写了一篇叫《荆生》的小说，在小说中，别有用心地塑造了个叫“伟丈夫”的豪杰，由这个伟丈夫出面将几个主张白话文推行新文化的人物狠狠专政了一通。林纾这么写，除了精神胜利外，还在暗中怂恿那些个手握枪杆子的“伟丈夫（军阀）”出面，用政治甚至军事的手法来解决文化问题——“伟丈夫”是谁也一目了然：当时正是北洋三杰之一徐树铮炙手可热之际，而林纾又正巧与此人交情不浅，林纾显然是想通过这篇小说来暗示启发这军阀大开杀戒，“该出手时就出手”，把文坛上自己的论敌一网打尽！然而，因时移世转，制度上的共和，保证了文人在言论上的自由，文人主张白话推动新文化，这在法理上并无过错，更谈不上杀头。所以，“伟丈夫”即使权倾一时，也无法大打出手大开杀戒。更为残酷的是：徐树铮也不仅没有能够收拾新文化运动的领军人物，而且他自己也很快在军阀的纷争中失意——先遭逮捕，旋即未经审判被杀，死得不明不白，“伟丈夫”成了冤死鬼！林纾想借武力来行文化专制的希望当然也就成了泡影。

再看小的为人方面。当年，林纾正在文坛上威风八面之际，恽铁樵在自己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刊载了他的文章《技击余闻》。钱锺书的父亲钱基博看了以后，觉得林纾的文章尚可补充，就撰写了《技击余闻补》，也获得《小说月报》的连载。于是，就有读者来信称赞钱基博的文章笔力劲峭苍古，其水平在林纾之上。这信不知怎么给林纾知道了——本来，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作为文坛老作家的林纾，看到文坛上后继有人，而且青出于蓝（林纾大钱基博35岁），他应该高兴才是；即使不高兴，也只应该在家中发发牢骚，慨叹一下“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罢了。可他不，一听有人的古文居然比自己好，就恶从胆边生地要捣乱，要倚老卖老，要仗势欺人：立即写信给商务印书馆编辑部，要挟“此后愿让贤路，不再贡拙”——换句话说：你们要再登那姓钱的小子的文章，那你们就登去，老子再不为你们写了！斯时的林纾可是炙手可热的文坛大腕，而钱基博呢，不过“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文学青年，二人相较，就好像今天的王蒙老师和一个仅仅在报纸上发过豆腐块文章的毛

头小子一样。书馆编辑都是明察秋毫的势利眼，自然知道轻重，于是赶紧停载小人物的文章，让林大人の大作在自己杂志上一枝独秀，开中国文坛仗势欺人之恶劣先例！事情到了这一步，林纾已不可避免地成为文霸学霸，可事情还没有完：他还“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地嘱咐商务印书馆以后不许印钱基博的书——大有将其封杀的意味；而当有人介绍钱基博到北京师范大学教书时，他又从中作梗，把事搅黄。其骄横与霸道，真让人叹为观止！后来，钱基博在论及此事时，曾感慨万千地这么写道：“十五年前，以博偶尔持据（指‘闻补’一事），见之不胜愤愤，无端大施倾轧，文章化为戈矛，儒林沦于市道。嘱商务不印拙稿，而不知博本勿市文为生，有友人介博任北师大国学讲座，其时畏庐在北京文坛，气焰炎手可热，口作臧否，致成罢论，知者多为不平。然博以为真读书人，正当化矜释躁，微其学养，何意畏庐六十老翁，不能宏奖后进，而党同妒道若是！胜我不武，不胜见笑。博苟卓然有所自立，畏庐尸居余气，文章真赏，来者难诬，身后千秋，尚待博为论定。……畏庐身价既倒，博撰次《现代中国文学史》，平情而论，胸中既未尝有不平之气，更何必加以寻斧，效恶声之必反？故博前日于畏庐不肯轻降身相从，而在时移世异之今日，亦不敢助长者张目，作寻声之骂，诃禁不祥也。”真的，“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林纾也太以为自己一旦得势，就可千秋万代了，结果，自然是徒留笑柄。

钱锺书先生在那篇《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说：“文人好名争名，历来传为笑柄，只要不发展为无情、无义、无耻的倾轧陷害，终还不失于‘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不过，就林纾想借助军阀力量对白话文作家进行修理和仗着自己“老作家”身份地位而对年轻作家进行无微不至的打压，显然已不是“人间喜剧”里一个情景轻松的场面”了！而作为钱基博的儿子，钱锺书却能在自己文章中对林纾这老前辈在翻译和文学上的成就作出那么公正客观的评价，则更显示出现代文化人那“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胸襟和气魄。

林纾、梁实秋及其他

文人之间的争论，应该由文坛内部自己解决——西方人所谓“把上帝的归给上帝，把恺撒的归给恺撒”讲的就是这个道理。可就有些文人偏偏觉得文字的力量不足以解决文坛上的问题，所以他们总爱想方设法地将文坛外的势力引入文学批评与文化论争之中，来它个狗仗人势狐假虎威。

民国初年，有一个军阀叫徐树铮，此公号称“北洋三杰”之一，作为段祺瑞的心腹之一，曾在政界军界呼风唤雨，得意一时，可以说是一个炙手可热的政客。他在玩政治，玩枪杆子之余，还思出其位做起儒将美梦——想玩笔杆子：他做了一部叫《徐氏评点古文辞类纂》的书，在书中大显其“文才”。为了炒作，还找了当时“桐城派”领军人物的林纾为此书作序。林纾不负厚望，在序中，将这赳赳武夫吹捧得花枝招展，说什么当今天下大乱，大家不惶宁处之际，徐将军却能在戎马倥偬之余，还能“出其余力以治此，可云得儒将之风流矣。”这马屁可谓拍得不轻！其时，林纾已不是当年靠用古文翻译外国小说而声名赫赫的人物了：因为新文化运动的风起云涌，这个抱残守缺的古文大师被打成了“桐城谬种”，成了落水狗；由他们把持的京师大学堂也改名为北京大学，规矩随之一变：不仅林纾等桐城派人物被逐出校园，而且，他们引以为豪的古文也风光不再。林纾怎么咽得下这口气？——这正如他在《与姚永概书》中所云：“非斤斤于此辈争短长；正以骨鲠在喉，不探取而出之，坐卧不爽也。”可是，争又争不赢：白话阵营中的陈独秀、胡适、周氏兄弟个个中外皆通，伶牙俐齿，

你说一句，他有十句更厉害的在等着你！书呆子一急，就想到了他那位手握枪杆子却染指笔杆子的“儒将”，于是林纾抽笔写了一篇叫《荆生》的小说，在小说中，别有用心地塑造了个叫“伟丈夫”的豪杰，由这个伟丈夫出面将几个主张白话文推行新文化的人物狠狠修理，聊快其意——鲁迅后来在《我的态度气量和年纪》一文中说道：“林琴南先生是确乎应该想起的，他后来真是暮年景象，因为反对白话不能论战，便从横道儿做一篇影射小说，使一个武人痛打改革者——说得‘美丽’一点，就是神往于‘武器的文艺’了。”这是典型的狐假虎威与狗仗人势。可惜，武夫一怒，文人流血的时代已难见于共和，徐树铮这“伟丈夫”不仅没能为自己的文字知己大打出手，倒是自己很快在“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军阀争斗中失败并被杀。

到了三十年代，新派人物梁实秋又想在文坛争端中引入政治势力：当时，左翼作家冯乃超在《阶级社会的艺术》中骂梁实秋是“资本家的走狗”！梁实秋生了气，就在自己《“资本家的走狗”》一文中悻悻地写道：“我只知道不断地劳动下去，便可以赚到钱来维持生计，至于如何可以做走狗，如何可以到资本家账房去领金镑，如何可以到××党去领卢布，这一套本领我可怎么知道呢。”这里，他为了报复对方，就故意在文中提到“××党”（当然就是指“共产党”）——这显然是在暗示当局主张“文学有阶级性”的人都有“领卢布”是“共产党”的嫌疑，而这一点在血雨腥风的三十年代是足以把一个无辜文人送进地狱的。很明显，梁实秋在这里已逾出正常批评的范围而在玩弄阴谋诡计了。也就是这个原因，鲁迅才在《“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中怒斥梁实秋：“在梁实秋，也许以为给主子嗅出了匪类（‘学匪’），也是一种‘批评’，然而这职业比起刽子手来，也就更下贱了。”这清楚地指出：梁实秋这么做，是为了讨好统治者，通过政治势力来扑杀文艺异己。鲁迅在此文的结尾处还说：“为将自己论敌指为‘拥护苏联’或‘××党’，自然也就髦得合时，或者还许会得到主子的‘一点恩惠’了。但倘说梁先生意在要得到‘恩惠’或‘金镑’，是冤枉的，决没有这回事，不过想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罢了。所以从‘文艺批评’方面看来，就还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个形容字：‘乏’。”在这里，鲁迅又明白地指出：梁实秋所以污蔑自己的论敌是在“拿卢布”拥护“××党”，这是在借政治之力，济自己“文艺批

评”之穷——所以说，他是“乏”走狗！此言一出，梁实秋除了哑口无言外，别无选择——因为利用文字外的力量来解决文坛内的争端，这到底是上不得台面的下三烂做法，一经别人揭露，则不仅暴露自己在文艺批评和文化论争上的“乏”，而且还反映出自己在人品上的“次”！还有什么话好说呢？

可是，也许是因为这政治太有魅力了，所以，在发生一些文字之争时，一些自以为有政治资源来置对方于难堪的文人就总也忍不住“借此助一臂之力，以济其‘文艺批评’之穷”。

也许，所有想利用政治势力来助自己文艺批评或文化论争一臂之力的文人，其如意算盘都是扬长避短——既能够使用自己文字出众之长（这是一般政治家不具备的），又可以利用政治压人之强（这是一般文人不具备的），两美具，二好全，当然所向无敌。这倒叫人想起这么一个笑话：一个年轻漂亮的舞女（有人说是邓肯）向一个年老貌丑的作家（有人说是萧伯纳）求婚，她的理由是：以我的漂亮，加上你的智慧，我们生出的孩子一定既有我的漂亮又有你的智慧。而作家的回答则是：这孩子完全可能既有你的愚蠢又有我的丑陋。作家借助政治势力进行论争，其用意就有点像这舞女，而事实却往往如作家所言。

晚年梁启超

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广东新会人梁启超是一个绕不过的大人物。在中国近、现代变幻的政治、文化风云中我们常常能看到他匆忙而又独具风格的身影——可谓天下之大，舍我其谁？这儿我们介绍一点他晚年的趣闻。

晚年的梁启超像周游列国的圣人孔子一样倦于政治而专心学术教育，他受聘于清华大学，出任国学院四大导师之一。开始了他“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一乐也”的桃李生涯。第一天上课，梁启超低着头，像是自言自语：“启超我没有什么学问——”学生们当然吃了一惊：谁不知道这位戊戌变法的主角是“匹夫而为百代师，一言而为天下法”的鸿学巨儒？他那手“笔端常带感情”的“新民体”秀文可是那个时代的青年必读文本呵。于是大家全神贯注地盯住他，静候下文。“当然喽，”梁启超抬起头，蔼然一笑，“也有那么一点真学问！”而后便是脍炙人口的学问大展览。学生们顿有身入宝山，美不胜收之感——以梁启超世罕其匹的国学修养辅之以曾左右政局的政治阅历，其讲课之精彩迭出，是可以想见的。当然，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他也有上课卡壳的时候——一个人名或一个时间，到了口边却忘了。这时学生们特别兴奋：大家都特别希望看到这大学问家露怯——否则，岂不衬得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地自容了么？梁启超开始在教室内走动，皱眉苦思。还不行，于是伸出手——像我们平时对付突然没了声的收音机一样——猛拍自己那宽大的额头，这一拍还真有效，“收音机”马上又有了声音。于是教室里又荡漾起他那出入经史纵横天下的“广味”官话。学生们彼